

前言

以研究同盟政治著称的美国学者乔治·里斯卡（George Liska）曾言：“不提及同盟就无从谈论国际关系。”¹ 同样，不研究新中国同盟外交，² 就无法了解这个国家前三十年的外交史。同盟外交在新中国的外交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鲜少有人对这一重要而又有趣的历史现象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在波士顿大学读博期间，我就对新中国同盟外交很有兴趣，但要把它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有些犹豫和踌躇。一是因为历史研究在美国的学界略显老套，博士生们更热衷于用量化研究的方法研究现实问题。二是为了有别于历史系的学生，我还需要找寻一个能够解释中国同盟外交的理论框架。尽管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及充满智慧的结盟策略，尽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国际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但它们都不足以解释新中国的结盟行为，为此，我不得不尝试从西方国际关系同盟理论中寻求灵感。但如何实现西方同盟理论与新中国的交实践间的对接是一个值得探讨但却是一个不易找到甚至永远也找到答案的问题。三是新中国的同盟外交研究涉及至少六个国家以及他们独特的语言，作为深受兰克学派影响的学生，我崇尚第一手材料，甚至到了没有第一手材料就无法搞历史研究的地步。在互联网还不甚发

¹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9, p.3.

² 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达、解密材料仍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我对能否获取足够多的第一手材料没有把握。但对我而言，中国的同盟外交太过于有趣和重要，我决心知难而进，对新中国的同盟外交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收集材料到论文终稿历时四年，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晓。期间，我靠着每天二升的可乐，在马友友演奏的如泣如诉的《美国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大提琴曲中艰难前行。2005年6月，毕业论文获得通过。此时，我近不惑，却成了可乐的瘾君子，一听到《美国往事》就禁不住要潸然泪下。

尽管论文侥幸通过，但我深知通过的论文缺少第一手材料。2004年1月，中国外交部正式开始向社会开放部分解密档案，这为我弥补论文的不足提供了契机。迄今为止，中国外交部已开放了三批档案，包括2004年解密的大约一万份涵盖1949–1955年的档案、2006年解密的大约25000多份涵盖1956–1960年的档案、2008年解密的41000多份涵盖1961年–1965年的档案。开放档案数占同期总档案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大约30%提高到2008年的70%。基于这些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我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大幅度，甚至是颠覆性的修改。遗憾的是，2009年以来，曾率先开放外交档案的中国外交部不再解密新的档案，原先可以调阅的解密档案也有很多莫名消失。2017年，我曾斗胆上书，呼吁外交部重新解密外交档案，以便推动新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但信如泥牛入海。由于1965年以后的外交档案尚未解密，本书不得不依赖二手材料对此后的中越、中巴和中阿同盟进行探讨。

新中国头三十年进行了三轮结盟的尝试。第一轮发生在五十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结成了法理同盟，并与越南和朝鲜结成了事实同盟。为把法国驱逐出印度支那，中国向越南秘密派出了军事和政治顾问团；差不多同时，中国又不得不出兵朝鲜半岛，挽救处于崩溃边缘的朝鲜。中苏同盟是新中国领导人主动谋划的结果，中朝与中越同盟更多的是一种

应激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中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彼此孤立，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横向的协调机构。尽管他们地理上联成了一片并面临共同的对手美国，但他们未曾像苏联与东欧国家那样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集体安全组织。

中苏同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危机引发了新中国第二轮结盟的尝试。阿尔巴尼亚在中苏两党1961年的争论中站到中国一边并成为中共坚定的支持者。这种紧密的政治关系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发展成全面的政治军事同盟。中苏同盟从分裂到解体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从友好到冷淡再到敌对，直至兵戎相见。中国与印度的传统对手巴基斯坦的关系随即转暖并最终结成事实同盟。

中阿、中巴同盟在六十年代的发展轨迹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意识形态挂帅与地缘安全优先——在中国外交中的作用。意识形态因素在中阿同盟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中巴同盟的形成显示出地缘安全因素在中国决策中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两种哲学同时作用于六十年代的中朝同盟，但由于处境不同和目标差异，中朝在两种哲学的选择上出现分歧，两国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

新中国第三轮结盟延续了前两次跌宕起伏的特性，中国同盟在整个七十年代又经历了最后一轮分化和重组。中国与自己的宿敌美国握手言和，并曾尝试联手建立一个反苏的统一战线。中、美关系的缓和使中国与传统的盟友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出现难以弥合的分歧。随着中国领导人的更换，中国与越、阿之间的齟齬和争吵有增无减并最终在七十年代末分道扬镳。阿尔巴尼亚对中国口诛笔伐，恶语相加；中国和越南这对“同志加兄弟”的国家不得不在战场上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中巴同盟在七十年代经历了第二次战火的考验，中国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巴基斯坦宝贵的帮助。

中阿和中越反目宣告了新中国同盟外交的式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针对第三国的、基于军事互助基础之上的同盟已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宣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³ 邓的讲话尽管从官方层面中止了中国与大国结盟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抛弃了过去的同盟。中国与巴基斯坦事实上的同盟关系没有发生重要变化，中国与朝鲜签署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然有效。尽管如此，同盟的地位在以后的中国外交中已大不如昔。中国无意建立新的同盟，旧的同盟关系要不名存实亡，要不就蜕变成一种新的伙伴关系。

本书挑选中国与苏联、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同盟案例，尝试分析和归纳中国结盟行为的特点特征。这些案例差不多构成了新中国所建军事同盟的全部家底，因而避免了案例研究中容易出现的选择偏见。本书按照结盟的时间顺序逐一对这些同盟的形成、发展和解体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本书第一章对中国历史中脍炙人口的经典同盟案例进行回顾和分析，试图发现这些历史遗产中所包含的发人深省的外交哲理以及它们与现代同盟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本章的重点是要厘清“同盟”概念，从土生土长的中共统一战线理论和舶来的西方同盟理论中找寻可以解释新中国结盟行为的理论框架。本章选取“力量聚合”理论以及修正后的“安全—自主交换”理论来诠释新中国同盟的形成与解体。本书认为，应对外部威胁是中国同盟行为的主要驱动力；意识形态在中国同盟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辅助的、第二位的作用；共同威胁的消

³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86页。

失是导致同盟消亡的最重要因素，而同盟内部利益分配的长期不平衡则是导致同盟解体的第二重要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探讨中苏同盟的形成与解体。苏联（俄罗斯）是中国的近邻和强国。历史上，它既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曾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盟友。中苏两国有着爱恨交加的历史恩怨。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缘由似乎无需太多的解释，现有的研究在这方面探讨得比较充分，但对中苏同盟何时解体以及为何解体学界却各说各话。通过参照现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本章认为，中苏同盟从1950年正式缔结到1959年实际解体历时不到十年，个中原因虽然很多，但同盟内部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利益分配的不均以及对美国政策上的重大分歧是导致中苏同盟从分歧到分裂再到名存实亡的主要原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是同盟解体的结果也是原因，其作用充其量是第二位的。

第三章分析中朝同盟关系四十年的演变。中国与朝鲜有着“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尽管中朝关系十分重要，但研究它的中国学者并不很多，中朝同盟的演变及其原因鲜为人知。新近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为深入了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朝关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第一手材料。本章重点在于探讨意识形态和地缘安全两个因素对中朝同盟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同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因素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到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对这两个因素的不同考虑导致这一经过血与火考验的同盟关系经历了从亲密到冷淡再到亲密的戏剧性演变。在对中朝同盟影响中，意识形态与地缘安全因素长期较量，此消彼长，朝鲜半岛分裂分治的地缘安全现实最终成为影响中朝同盟关系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第四章的研究案例是中越同盟。对中国而言，越南与朝鲜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中国的近邻；曾为中国朝贡体系的核心成员和安全缓冲地带；领土大小相近，国家制度类似；领导人与中共首脑有着较深的历史交情。但就中越同盟变化的程度而言，中朝同盟望尘莫及。中

越两国在共同抗击法、美之后，兵戎相见。中越两国如何从盟友蜕变成对手是本章重点探讨的问题。本章认为，在中越联盟的产生和解体上美苏两国起到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作用。如黎笋所分析的那样，“我们两国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主要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苏联和美国。”⁴ 六十年代后半期越南不顾中国“反帝反修”的主张而接近苏联、七十年代初中国在越美酣战之际谋求中美关系的缓和，中越在对美苏两国政策上的背离反映出两国根本利益的分歧。虽然领土争议、华人华侨等问题也在加速中越联盟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作用从根源来看是派生的，在重要性上是次要的。

第五章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阿尔巴尼亚同盟。中阿相距千里，大小迥异，又缺乏历史交情，他们结盟成就了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奇特的现象。本章的重点是进一步探讨意识形态在中阿同盟中的作用。中阿联盟在中苏意识形态之争中产生，却又在尖锐的中阿意识形态纷争中解体。意识形态确实对两国关系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如果离开现实的国家利益，这种影响既不稳定，也不一致。两国关系好的时候，意识形态因素起到黏合的作用，而双边关系恶化后，意识形态因素却又成为争论的焦点，并使双边关系更加难以驾驭。尽管阿尔巴尼亚所处地理位置超越了中国力量传统的投送范围，中国不可能像帮助朝鲜和越南那样在阿尔巴尼亚遭受攻击时提供及时而有效的帮助，但对阿而言，中国不仅是阿经援的重要来源，而且是阿军事上唯一可以倚重的对象。这种依赖的极端不对称导致了同盟利益分配的长期失衡，并使之成为中阿同盟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章研讨的是中国—巴基斯坦同盟。与中国大多数的同盟国不同，巴基斯坦既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与中国没有太多的历史联系。

⁴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67页。

更为重要的是，中巴结盟前，巴基斯坦还曾是美国构建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关键性的成员。如果没有中国与印度交恶，中巴恐很难成为盟友。与对其他同盟国的政策不同，中国对巴一直实施了进退有据的务实策略，一方面，一直影响中国同盟外交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巴关系上难觅踪影，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中大行其道的时代，中国与苏联、阿尔巴尼、朝鲜和越南的关系都因意识形态问题大起大落过，中巴关系的发展却特立独行，在没有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下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对巴关系中只追求有限的政策目标，这个目标既不强人所难迫使巴基斯坦退出美国主导的两个军事条约组织，也不要求巴基斯坦断绝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是寻求与巴建立一种针对印度的事实同盟的关系。由于地缘安全的考虑成为影响中巴同盟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巴同盟成为新中国诸多同盟中凝聚力最强、内部纷争最少、存续时间最长的同盟。与中苏、中越、中阿同盟形成对照的是，中巴同盟的结局十分圆满，两国顺时应变，在上个世纪末巧妙地把他们之间同盟关系转化为新型的不针对第三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有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在学术期刊发表。

本书在写作过程得到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博士卓（Joseph Fewsmith）教授。他在美国学界以研究中国的“精英政治”著称，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在博士毕业论文写作的每一阶段，博士卓教授都给予我十分有益而又具体的帮助。论文的终稿包含了导师细致入微的评论和建议。同时，我还要感谢另一位良师益友戴维·梅尔（David Mayers）教授。梅尔教授博学多才，是苏联（俄罗斯）问题专家，也是迄今为止我碰到的最好教授之一。虽然他有着1.90米以上的高大身材，但为人十分谦逊和蔼。他在担任系主任期间虽公务繁忙，但却有约必应，并以最温和的态度提出最具建设性的意见。

此外，刘波（博士生）、张磊（博士生）曾帮我将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孙伟、李娜、牛勇和向思敏等同学先后帮助查阅外交部解密档案或校阅稿子。在这里，我对他们辛苦付出表示诚挚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李庆、成柯。在我读博、写书期间，他们给予我极为宝贵的支持。